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认识和评价辛亥革命的逻辑转换

杜家丞

摘要 辛亥革命是中国革命史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唯物史观,在认识和评价辛亥革命过程中先后形成以阶级革命和民族复兴为核心主题的叙事逻辑。随着时代条件和实践需求的变化,两种逻辑经历了从前者转换到后者的发展过程。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后,中国共产党确立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对辛亥革命作出新的认识和评价。尽管在改革开放以后,民族复兴逻辑逐步占据主导地位,但绝不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抛弃了斗争精神和革命精神,坚持敢于斗争、坚持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经验,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力保证。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辛亥革命;阶级革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图分类号 D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2)03-0085-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1&ZD039)

2021年10月,习近平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指出,辛亥革命“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先进分子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进行的一次伟大而艰辛探索”^[1]。辛亥革命作为中国革命史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从未离开过中国共产党的视野,但进入视野的环境和方式已与百余年前大不相同。近年来学术界关于中国共产党认识评价辛亥革命的研究成果,或是从史料入手梳理中国共产党对辛亥革命的认识状况,如史艺军、宋成东从长时段着眼梳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不同历史时期对辛亥革命评价的不同政治特点和文化特色^[2],齐卫平、樊士博则聚焦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对辛亥革命的认知及其与民族复兴历史使命的关系^[3];或是从理论出发总结中国共产党研究辛亥革命的基本观点和经验教训,如王顺生以毛泽东《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纪念孙中山先生》为基础,从辛亥革命的直接打击目标、革命政权的性质、发展资本主义的目的、对民主共和国观念传播的影响四个方面论证“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论断的科学性^[4]。这些成果基本代表了学术界目前达到的研究水平,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多把研究视野局限在党的十八大以前,对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认识和评价辛亥革命的新进展缺乏追踪研究;二是多停留在历史材料的罗列和整理,对中国共产党评述辛亥革命背后的历史观和认识论的关注稍显不足。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重视对辛亥革命的认识、研究和评价,既从中汲取革命的教益,又在评述辛亥革命的过程中逐步构建起两种历史叙事逻辑——阶级革命逻辑和民族复兴逻辑。其中,前者以阶级分析为出发点,以阶级革命的成败得失作为评价历史事件的根本尺度;后者则把历史事件置于中华民族发展史的视野中,探求其在寻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进程中的作用和意义。两种逻辑的切入视角和评判标准不尽相同,但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运用唯物史观和大历史观认识和评价历史的重要指针。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试图从叙事逻辑的建构着眼,对中国共产党人在认识和评价辛亥革命时主要运用的阶级革命逻辑和民族复兴逻辑以及两者间前后转换过程作一初步探讨,从而

加深对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历史观的理解。

一、阶级革命逻辑下的辛亥革命

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基本逻辑和基本方法。毛泽东指出：“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51](P283)为了解决分清敌友这个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必须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51](P3)进行分析，以此制定正确的革命路线和策略。中国共产党人是依靠阶级斗争取得革命胜利的，阶级分析的思维方式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很长时间内，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念仍在重要历史关头被屡次激活。因此，自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共产党人对辛亥革命的认识和评价主要是依照阶级革命的逻辑进行的。

第一，辛亥革命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阶级革命逻辑对辛亥革命性质问题得出的郑重结论。1923年4月，陈独秀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较早明确作出“辛亥革命本身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的判断，并且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对辛亥革命发生的“经济的历史的基本条件”作出初步说明，指出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封建帝制变化到资本民主之剧烈的开始表现”^[61](P348-349)。1939年冬至翌年春，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第一次从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和动力等方面雄辩地证明，中国近代以来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革命运动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而辛亥革命则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个革命”^[71](P667)。1954年9月，面对党内外一部分人对辛亥革命性质的质疑，毛泽东通过列举人类社会历史中奴隶主对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封建地主对奴隶主、资产阶级对封建地主阶级等三次性质不同的革命，重申辛亥革命“确实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81](P344)。可见，中国共产党人对辛亥革命性质的认定是一以贯之的，不管后来对其具体评价如何改变，这一定性始终未变。

第二，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进步意义必须充分肯定，同时，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不可能成功，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不能救中国。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91](P402)中国共产党人在认识和评价辛亥革命时从未低估它对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积极作用。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就在第一次发表对时局的主张中肯定辛亥革命是“适应近代由封建制度到民主制度，由单纯商品生产制度到资本家商品生产制度之世界共同趋势的战争，是在历史进化上有重要意义的战争”^[101](P89)。辛亥革命30周年之际，林伯渠撰文着重强调辛亥革命推翻专制政体、开创民主共和的历史贡献^[11](P646)，董必武也指出“没有辛亥革命，某些进步更为迟缓，也许某些进步成为不可能”^[121](P74)。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从推翻清朝统治、结束封建帝制、创立革命政府、制定临时约法、推动人民觉醒、破坏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秩序、引起全国民主革命精神高涨等方面全面阐述了辛亥革命“伟大的历史意义”^①，同时在1955年、1956年、1966年隆重纪念孙中山的逝世和诞辰，毛泽东亲自撰文尊其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131](P156)。“伟大的历史意义”和“伟大的革命先行者”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辛亥革命及其领导者孙中山的认识和评价已臻成熟。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人认为，辛亥革命就其客观结果而言是不彻底的或失败的，在20世纪20年代初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加紧压迫中国人民的严酷背景下，瞿秋白甚至喊出“中国的辛亥革命死了！”^[14](P1)的悲观口号。对于革命失败的原因，陈独秀、张太雷、蔡和森、赵世炎、毛泽东等共产党人都曾作详

① 这一概念较早出现于1954年9月毛泽东所作的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的谈话中，此后刘少奇、周恩来、李维汉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评价辛亥革命时都沿用了“伟大的历史意义”的提法。

尽探讨,认为辛亥革命在革命宣传方面没能提出正确的纲领和口号,在革命力量方面缺乏团结和统一,在革命组织方面偏重军事运动而忽视民众运动,更严重的是革命初胜后倾向于对外同帝国主义列强、对内同封建军阀和党内右派分子谋求妥协。进一步地,中国共产党人从阶级和时代两方面探寻革命不彻底性和妥协性的深层原因:其一,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幼稚而软弱的阶级。陈独秀曾指出,当时的资产阶级“未曾发达到与封建官僚阶级截然分化的程度”,阶级内部仍缺乏“阶级间利害不同的觉悟”^[6](P349)。因此,民族资产阶级既“不认识帝国主义的真面目”,对封建主义的理解也很“肤浅”^[15],最终将革命政权拱手让予敌人。其二,就时代条件而言,毛泽东曾深刻指出,辛亥革命发生在“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觉醒,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全世界无产阶级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还没有实际革命行动,只是准备革命的时候;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还是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后备军的时候”^[16](P402-403),而帝国主义列强不可能允许中国革命彻底成功,辛亥革命后帝国主义在南北和谈中助袁反孙就是最好的例子。由此,中国共产党人从主客观两方面综合说明辛亥革命及其资产阶级共和国理想的最后流产是不可避免的。

第三,只有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

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局限性相对,中国无产阶级尽管人数较少、年龄较轻、文化水准较低,但其身受压迫最深、代表的生产方式最先进,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必然成为“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动力”^[7](P645)。由此,辛亥革命的未完使命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肩上。建党之初和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明确以“完成辛亥革命,彻底解放中国于帝国主义及军阀之下”^[17](P225)为己任,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问题,但由于当时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在党内仍占统治地位,对无产阶级仍满足于“督战者”^[18](P178)的角色,大革命遭到惨重失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只有无产阶级才是“辛亥革命唯一的完成者与领导者”^[19](P648),并指出“以前的辛亥革命是推翻满清的专制,往后的辛亥革命是推翻国民党的专制”^[20](P973)。经过长期不懈奋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完成了孙中山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了伟大的成就”^[21]。毛泽东正是从无产阶级接续和发展资产阶级革命这个意义上说:“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13](P156)

根据上述分析可见,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娴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基本原理对辛亥革命的成败得失作深入剖析,逐步构建起以阶级革命为核心的叙事逻辑,形塑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对辛亥革命的认识和评价。然而,阶级斗争是辛亥革命的本质方面,但毕竟不是全部方面。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不断推进,“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逐渐远去,辛亥革命日益需要在能够适应时代特征和实践要求的崭新叙事逻辑中得到阐释。

二、阶级革命逻辑的淡出与民族复兴主题的凸显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是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历史转折期,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和评价历史的两种叙事逻辑——阶级革命和民族复兴——的历史转换期。在这一时期党对辛亥革命的评述中,阶级革命作为完整的叙事逻辑逐渐淡出人们视野,只保留一些基本概念;另一方面,民族复兴作为自孙中山起就被提出的口号,其地位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不断向前迈进而日渐凸显,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对辛亥革命的理解。

在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历次辛亥革命的周年纪念讲话中,有两次仍保留着部分阶级革命话语。第一次是在1981年辛亥革命70周年,当时“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党和国家尚处于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过渡时期,在历史叙述和评价方面仍不可避免地带有革命年代的痕迹,胡耀邦

在讲话中追述19世纪后期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新兴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和20世纪初具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民主思想的爱国志士领导革命运动的历史,指出辛亥革命没有能达到“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预期目的”^[22](P969)。同年,党内著名理论家胡绳在一次纪念辛亥革命的演讲会上再次阐明“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一次革命”,指出“如果说辛亥革命是全民革命,而不作阶级分析,就无法说明这次革命的性质,对于这次革命的成功和失败也不可能作出适当的解释”^[23](P309)。第二次是在1991年辛亥革命80周年,当年的纪念大会是在苏东剧变和国内政治风波刚刚过去不久,西方国家妄图对中国实施封锁和制裁,国内仍然强调反和平演变斗争的严峻环境下进行的。杨尚昆在讲话中肯定辛亥革命历史功绩的同时,仍称孙中山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杰出代表”,指出孙中山效仿欧美国设计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终因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帝国主义支持中国的反动势力而落空”,并着重提及孙中山在晚年“明确地把反对帝国主义作为革命斗争的首要任务”^[24](P1714)。同年,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重申“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革命取得成功”,中国革命需要“有一个先进思想武装的先进阶级的政党来领导”的论断^[24](P1628)。

应当指出,尽管上述文献仍保留了对辛亥革命和孙中山阶级性质及其局限的表述,但都是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从总的趋势来看,自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阶级革命话语已基本从党对辛亥革命的评述中淡出,反之,辛亥革命与民族复兴之间的内在联系不断得到强化。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作为革命的首要任务,但也清醒地认识到要完成这一任务,必须在反对国内封建统治阶级的同时毫不妥协地同帝国主义作斗争,如瞿秋白在1925年所言,抵制帝国主义侵略是“中国民族加入世界史的最重大的责任”,应当成为中国人的“民族自觉”^[25](P76)。因而,是否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成为党在革命和建设时期评判辛亥革命成败的重要标准。具体而言,中国共产党人肯定了辛亥革命在“反对外力压迫之自强运动”方面的重要意义,同时又以此为标准毫不留情地批评辛亥革命反对外力压迫之不彻底,如蔡和森即通过辛亥革命与义和团运动的对比,指出前者“完全抹煞了庚子起义的排外精神”^[20](P655)。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此作出中肯的评价——“辛亥革命实际上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作用”,但“当时的革命党人的主观上并没有认识这一点”^[26](P318)。简言之,尽管此时中国共产党人已明确提出民族精神、民族自觉、民族独立等理念,但强调的是民族独立的实现离不开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阶级革命,对辛亥革命也主要从资产阶级软弱性导致反对帝国主义的不彻底性方面提出批评。

进入新时期以后,与阶级革命话语的淡化相应,时代特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促使民族复兴命题的地位日渐凸显。其一,时代主题从“战争与革命”逐渐向“和平与发展”转变,世界范围内的两极对峙格局仍然存在,但第三次世界大战并没有发生,不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相继转入国内经济政治的建设和改革,发展问题上的南北、南南合作提上国际议程。其二,以党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全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出我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22](P841),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其三,祖国统一大业特别是台湾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粗暴干涉而不得不暂时搁置,到20世纪80年代初作为三大任务之一被重新郑重地确立下来,包括两岸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大团结成为时代需要。其四,20世纪90年代以后,为克服80年代末全盘西化社会思潮带来的消极影响,应对90年代初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和制裁,树立中华民族自尊心、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中华民族精神成为实现安定团结、应对内外挑战的重要途径。

在上述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命题的提出成为必然,以民族复兴为核心话语的叙事逻辑在中国共产党人评述辛亥革命的过程中逐步建构起来。

一是把辛亥革命置于近代以来民族复兴运动的历史进程中加以审视。如杨尚昆在辛亥革命80周年时指出“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整个中国革命,都是一场民族复兴运动”^[24](P1715),江泽民在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讲话中完整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7]的概念,胡锦涛在辛亥革命100周年时进一步提出“辛亥革命永远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28](P524)。

二是充分肯定辛亥革命对民族复兴事业的积极意义。如胡耀邦着重指出辛亥革命“在近代史上第一次证明了中国的命运毕竟不是帝国主义所能任意支配的”^[22](P969),这一评价明显有别于以往以阶级革命逻辑为依据对辛亥革命反帝国主义不力的批评。此外,江泽民肯定了辛亥革命推动中华民族思想解放的作用,胡锦涛也指出辛亥革命“为中华民族发展进步探索了道路”^[28](P524)。

三是申明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支持者、合作者和继承者,中国共产党为之奋斗的事业是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需要指出的是,以往中国共产党人主要从继续完成辛亥革命未完成的任务的角度出发阐释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辛亥革命之间的联系,改革开放以来则主要从接续辛亥革命争取民族独立、实现民族振兴的角度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及取得的巨大成就对辛亥革命的发展。

四是把继承辛亥革命精神和当前斗争任务紧密结合起来。胡耀邦在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讲话时提出目前时期实现四化建设、保卫世界和平、完成统一大业三件大事^[22](P972);杨尚昆在回顾辛亥革命历史后提出我国人民最主要任务就是“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振兴中华民族”^[24](P1715),为此必须始终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必须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江泽民呼吁全体中华儿女携手共同完成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胡锦涛立足新世纪新阶段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完全统一是历次辛亥革命周年纪念讲话的规定议题,辛亥革命70周年和90周年时党的领导人均用超过全篇讲话四分之一的篇幅专门讨论台湾问题,力图在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强大精神纽带维系下促使中华民族早日实现团结统一。

根据上述分析可见,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随着阶级革命逻辑的逐渐淡出和民族复兴主题的逐渐凸显,中国共产党人对辛亥革命的性质定位、历史贡献、后世影响等问题进行新的阐释,历经三十多年努力,已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民族复兴逻辑的成熟定型奠定了良好基础。

三、新时代民族复兴逻辑下的辛亥革命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与此同时,习近平发表了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了许多原创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一是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指出这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29](P36),其基本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二是揭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30](P8)。三是宣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31]。四是确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党的百年奋斗主题,总结了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各个历史时期的伟大成就,将百年党史概括为“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弘的史诗”^[32]。

2021年以来,以习近平“七一”讲话和《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发表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本质内涵、历史进程、战略举措、发展前途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以民族复兴为核心主题,实现中华文明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共产党历史内在统一的叙事逻辑也达至成熟。正是在新时代新变革新思想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运用民族

复兴逻辑对辛亥革命作出新的认识和评价。

第一,辛亥革命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一次伟大而艰苦的探索。

这是习近平从唯物史观和大历史观出发,在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发展长河中对辛亥革命历史地位的重新审视。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创造了绵延五千多年的灿烂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31];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入侵和封建统治腐败,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但各种救国方案都以失败告终;直至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才成功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启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历史新纪元”^[1]。在这个“灿烂文明—遭受劫难—反抗斗争—走向复兴”的宏大叙事中,辛亥革命上承中国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的接续探索,下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的关键一环。

第二,尽管辛亥革命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但仍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

这是习近平对辛亥革命局限性的准确说明和历史功绩的高度概括。辛亥革命没能取得彻底成功的原因,从客观而言是“历史进程和社会条件的制约”,从主观而言是“没有找到解决中国前途命运问题的正确道路和领导力量”^[1],这样解释既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又为回答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成功之道做好铺垫。

对于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可从直接意义和后世影响两个方面分别阐述,前者包括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君主专制制度、拉开了近代中国深刻社会变革和中国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序幕,后者包括极大促进了中华民族思想解放、传播了民主共和理念、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撼动了反动统治秩序的根基、建立起亚洲第一个共和制国家,最后立足于“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探索了道路”^[1]。在两个方面深刻意义的基础上,习近平申明辛亥革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的“里程碑”地位。2018年12月,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33](P215)。从历史阶段性的角度来看,辛亥革命是五四运动以前唯一被称为“里程碑”的历史事件;从历史延续性的角度来看,辛亥革命和建党、立国、改革开放一同构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四个标志性事件。这与1982年修改宪法时提出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二十世纪四件大事^[34](P135)、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二十世纪三次历史性变化^[35](P2),其意蕴是一脉相承的;另一方面,尽管“里程碑”是对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讲话中提法的沿用,但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成熟的民族复兴逻辑之下又展现出崭新而丰满的历史意义。

第三,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不断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向前推进。

这是习近平在对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共产党历史进行深邃思考后得出的科学论断,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担当。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振兴中华”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同时也必将成为这一伟大事业的使命担纲者和最终完成者。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份初心和使命,习近平从领导力量、前进道路、斗争精神、统一战线、对外关系五个方面系统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对台湾问题也宣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立场和政策主张。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更多的是从肯定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经验的角度出发总结“启示”,这与阶级革命逻辑支配下对辛亥革命以批判为主的做法显然有别。

① 指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基本上形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② 第一次是辛亥革命,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第三次是改革开放。

根据上述分析可见,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斗争实践中不断把民族复兴伟业推向前进,使中华民族展现出欣欣向荣的昂扬气象,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在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时,中国共产党人突出了民族复兴这个贯穿整部中国近现代史的核心主题,建构起有别于阶级革命逻辑的民族复兴逻辑,以此重塑人们对辛亥革命的认识和评价,并从中取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益启迪。

四、结语

一百多年来,以历史叙事逻辑及其演变为标准,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和评价辛亥革命的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建党之初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辛亥革命的认知遵循阶级革命逻辑,把辛亥革命判定为一次典型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通过揭露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时代条件的局限性剖析辛亥革命失败的深层原因,论证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掌握革命领导权的历史必然性。第二阶段从改革开放以来至党的十八大以前,中国共产党对辛亥革命的认知逻辑随着时代主题、工作重心、斗争要求的变化而转移,阶级革命话语淡出,民族复兴意蕴凸显,辛亥革命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功绩被重新挖掘。第三阶段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对辛亥革命的认知遵循民族复兴逻辑,把辛亥革命看作近代以来民族复兴运动中一次伟大而艰苦的探索,中肯地指出辛亥革命未能成功的主客观原因,确立辛亥革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的里程碑地位,彰显中国共产党为实现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伟大梦想而接续奋斗的历史主动和历史担当。

自改革开放以后,在对辛亥革命的认识和评价中,民族复兴逻辑的地位日升而阶级革命逻辑的地位日降,但这绝不意味着辛亥革命没有阶级革命意义,也绝不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抛弃了斗争精神和革命精神。习近平反复强调:“不要忘记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是革命者,不要丧失了革命精神。”^[36](P70)《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坚持敢于斗争、坚持自我革命,是党经过长期实践积累的宝贵经验,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并在新时代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31]民族复兴和阶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根据不同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形成的两种历史叙事逻辑,作为占据主导地位的逻辑框架,二者必居其一;但作为历史认识方法,两者并不冲突,而是共同统一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大历史观之中。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2021-10-10.
- [2] 史艺军,宋成东.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对辛亥革命的纪念与评价.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
- [3] 齐卫平,樊士博. 民族复兴未竟事业的继承:中国共产党早期文献对辛亥革命的评述.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1,(10).
- [4] 王顺生. 正确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对毛泽东《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纪念孙中山先生》的导读.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1,(9).
- [5] 毛泽东选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6] 陈独秀文集: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7] 毛泽东选集: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8] 毛泽东文集:第6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12] 董必武选集.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 [13] 毛泽东文集:第7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14]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15] 董必武副主席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1961-10-10.

- [16] 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18] 陈独秀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20] 蔡和森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21] 在孙中山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周恩来总理的讲话.人民日报,1966-11-13.
- [2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 [23] 胡绳.胡绳全书:第3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 [2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25]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2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 [27] 江泽民.在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1-10-10.
- [2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29]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 [30]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31]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11-17.
- [32]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07-02.
- [33] 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 [3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3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 [36]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The Logical Shift of CPC's Understanding and Evaluation Of The Revolution of 1911 over the Past Century

Du Jiache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The Revolution of 1911 is a major historical event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 For more than a century, the Chinese Communists have adhered to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successively formed narrative logic with class revolution and national rejuvenation as the core themes in the process of understanding and evaluating the Revolution of 1911. With changing conditions and practical needs of the times, the two kinds of logic have undergone a developmental process of shift. In New Era, the CPC made a new commentary on the Revolution of 1911 as the CPC establish the goal of achiev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lthough the logic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gradually became the dominating logic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spirit of struggle and revolution was in no way abandoned. Adherence to struggle and adherence to self-revolution are valuable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CPC's century-long struggle, and consist a strong guarantee for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Revolution of 1911; class revolution;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 收稿日期 2021-12-16

■ 作者简介 杜家丞,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北京 100872。

■ 责任编辑 桂 莉